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符号学类型的文化考察及批判

张 碧

摘 要: 关于象征、符号与信号三种符号学类型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主义批评曾进行科学性界定, 并以此为逻辑依据, 根据对三种符号学类型间嬗递关系的社会考察, 就现代社会文化体系及交往过程中意义的单义化趋势进行了深入辨析和批判, 从而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立场及精神救赎理念。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类型, 考察, 批判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and Social Critique of Semiotic Types

Zhang Bi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up 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s given by Marxists to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ree semantic types: symbol, sign and signal. From this logical basis, Marxists conducted a soc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hree semantic types, advocating for their clear distinction and critiquing the trend to simplify notions of meaning in cultural systems and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society.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semiotic types further highlights the socio-cultural critical standpoint taken by Marxist thinkers and relates to the idea of spiritual salvation.

Keywords: Marxism, semiotic types, cultural theory, critique

DOI: 10.13760/b.cnki.sam.202001002

20 世纪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批评呈现出极为多元的发展态势。其中，以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主要以西欧、南欧等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当代欧洲马克思主义发展格局的重要板块。

拥有不同学术谱系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人类社会“象征”“符号”和“信号”三种符号学类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科学性讨论^①；同时，他们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三种符号学类型之间嬗变或替换关系的描述，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意义的单义化倾向，以此作为其现代社会文化批判及现代性精神救赎的重要视域。

一、三种符号学类型的表意过程特征及意义张力差异

长期以来，“象征”（symbol）、“符号”（sign）与“信号”（signal）三种符号学类型，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运用。尽管学界对三者间关系的界定较为庞杂^②，但一般而言，可做以下梳分和界定：

在当代学界，“符号”通常指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结构主义传统的意义上，其表意过程（signification）建立在系统内的差异性基础上，并在特定社群内体现出“任意性”（arbitrariness）与“约定性”（conventionality）的符号学类型，换言之，符号根据能指和所指任意结合的表意原则，在特定群体内逐渐获得约定俗成、相对稳定的意义。

“象征”的表意过程，体现出其能指形式对某种对象内涵的直接再现，且这种再现过程本身具有包容性和表意的张力。象征往往与某种抽象观念直接结合，从而呈现出某种价值属性或倾向。因此，一般而言，象征的主要特质或功能，便体现为通过一定能指形式，对特定群体的某种精神价值进行储蓄、积淀，并以此维持、激发这一群体的伦理秩序、文化生活乃至生产机制等。原始时期的原始神话及相应的祭仪、图腾等，由于寄寓着某一历史阶段中特定社会群体充沛的情感因素和精神价值，故而是人类社会中最初的象征形态。

此外，“信号”往往被与上述两种符号学类型相提并论。关于信号，学界

^① 本文所述的“符号学”（semiotics 或 semiology），采取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广义式理解，指以不同符号学类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非仅仅关注文中所涉的“符号”（sign）这一种符号学类型的学问。后同。

^②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费鲁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即持有独到的观点，认为象征只是符号的类型之一。（1977，p. 9）

通常将其界定为一种仅存在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单义性符号学类型，接受者只能被动接受其单独的信息意义，并据此做出相应的单一反应。相对于前两种符号学类型而言，信号的接收形式迥然相异，对此，不同学者均曾提出过相关见解：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指出，信号与符号的差异，在于它无法具有符号那样“指代他物的约定俗成性”（1979，p. 19）；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则认为，信号与象征的最大区别在于信号不需要接受者的阐释行为。（1955，p. 25）这些阐释，均描述出信号存在于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且不受接受者阐释行为和语境的影响而产生其他意义的单义性属性。

三种符号学类型在表意过程方面的不同，造成其各自意义张力，或曰意义丰富程度的差异。一般而言，象征由于直接关涉作为情感或精神观念的对象，具有较强的意义延伸性，故其意义张力最为明显，也便最具有情感性及诗性品质^①；对于符号而言，其意义由特定社群经过较长时间“约定俗成”的表意过程而确定，因此其意义更为稳固，意义张力亦相对较弱；信号是一种单义性符号学形式，因此意义张力显然是最弱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当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工具进行劳动时，其精神、思想便不得不与世界发生联系，于是人类的意识以及语言便在劳动的作用下产生；同时，人类的劳动是一种集体性、社会性活动，在社会性劳动的分工、合作过程中，人类便自发地产生交往诉求。（马克思，恩格斯，1960，p. 34）这样，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性特征也在各种符号学类型的中介作用下得以呈现，而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意义形态也是特定社会心理结构，乃至相应的社会结构的表征。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人类交往活动往往体现出象征、符号及信号三种符号学类型并存、嬗变或替换的复杂关系。对于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考察不同符号学类型及其为媒介的现代交往范式及其文化体系，便成为对人类社会活动进行科学性探讨的重要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社会符号学类型的科学考察

如上所述，各种符号学类型无不是人类进行社会性协作、交往的产物，

^① 关于意义的张力及与情感性及诗性的关系问题，英美新批评业已做出诸多经典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以其“有机语境论”（contextuales-organicos），同样对该问题进行了详尽阐述。详见其 *Critica del gusto*（Milán: Feltrinelli, 1963, pp. 107-118）。

体现出人类的类属性。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不同社会符号学类型的基本质态及其彼此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科学考察。

在其《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中，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曾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倾向。^①与学界关于符号的一般性结构主义认识不同，巴赫金在该作中提出，符号是特定群体或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并能够根据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而产生相应的全新意义，因此符号意义具备不断生成并更新的动态机制。同时，巴赫金关于“信号”的论述虽着墨不多，但其学术意义却十分深远。(Petrilli & Ponzio, 2005, p. 157)巴赫金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信号都与意识形态范畴(domain of ideological)毫无关系；与它有关系的，是技术装置世界(world of technical devices)及广义的生产性设施”。(Volosinov, 1973, p. 68)信号更多地出现于现代社会生产技术之中，是存在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间的恒定的信息承载者，且具有不受意识形态语境影响的基本属性。由此可见，由于符号具有动态的意义生成机制，而信号更多地体现为发出者和接受者间的单义化作用/反应机制，因此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意义生成机制的动态性和恒定性，这便是符号与信号在意义张力方面存在差别的主要原因。

由于历史语境及人类社会经验的变动不居，亦即社会历史自身的多样性，尤其是当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之间产生冲突、对抗及交融时，社会群体便根据其特有的社会实践目的，对符号的表意机制加以变动，从而使其在形式及内容层面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产生出一系列全新的意义。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借助巴赫金的“复调”概念，同样对促使新符号不断生成并使符号具有意义张力或意义多样化的机制属性予以了一定论述。同时，威廉斯也认识到，在具体社会活动中，信号所具有的信息单一性指向，使得社会成员在接受其传达的信息后，仅仅机械而被动地做出程序化的反应，无法对信息做出源自主体视域的其他理解和阐释。符号的复调性正是使其与信号产生本质差异的原因。由此，威廉斯

① 当代学界大多认为，该作虽署名为瓦伦丁·沃洛辛诺夫(Valentin Volosinov)，但实为巴赫金所作。另，关于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学界亦有争议，但包括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内的不少国内外学者坚定不移地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文根据学界多数意见，认为其《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作体现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相关论题，参见张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吗?》(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同样从意识形态语境中信息接收者对符号的阐释作用方面,对符号与信号做出了本质区分:“符号——正如其社会性经验一样,这些社会性经验是符号得以形成的基准……符号的特征不像信号仅仅具有固定、稳定而永不变更的涵义。……它往往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范畴之中,并在这些不可胜数的新语境中相应产生出新的涵义。”(Williams, 1977, p. 39)威廉斯对符号与信号关系的阐释,显然是对巴赫金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两位学者从不同群体或阶级间意识形态的交流及冲突角度阐释了符号的多元表意机制,并由此将其与信号做出区分。尽管与索绪尔对符号的经典界定不同,但他们却通过对符号与信号在表意过程中意义张力维度的比较,对其差异性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从而隐含地表达出社会意义张力的重要性。当然,关于这种社会意义多样性的精神内涵及价值,两位学者未做进一步论述。

较之巴赫金与威廉斯,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Adam Schaff)则从语用学角度,强调了符号或语言及现实间的关系(佩特丽莉,庞奇奥,2013, p. 183),尤其是信号在人类社会中的交往实践功能。他从索绪尔对符号的界定方式出发,认为“符号最突出的功能在于它是交往途径,以及某种交流意图”(Schaff, 1962, p. 175),同时,“信号的意图往往旨在激发(或变更、阻止)一项行为(action);信号之所以能够突显——在与意向性行为(action)间的联系方面,往往具有偶发性”。(p. 184)在现代社会生产活动和日常交往活动中,两种符号学类型都能够发挥交往功能,尤其是信号,由于其反应机制建立在人际交往行为的刺激与反应的基础上,因而能够在社会群体的特定场合内发挥实践性指令功能。这种认识对信号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交往功能进行了基本界定,也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信号化状况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沙夫看来,具有强烈意义张力及情感特征的象征在交往活动中发挥交往功能的效率虽不及信号,但在某些特定场合,例如祭祀、仪式中,象征通过对集体思想及情感的展现,体现出某种张力性较强的意义向度,并以此调动和激发民众产生不同的情感及思想价值,从而能够为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增添某种诗性品质。同时,通过对象征和符号与信号的表意机制的比较,沙夫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象征的情感性意义张力特质,具有某种特殊的精神价值向度,这也使其与符号,尤其是信号的工具性特征的差异被突显出来。(p. 193)然而,沙夫同样主要从科学维度来认识几种符号学类型的基本社会属性及功能,并未就其精神价值进行充分论述。

上述学者,基本以马克思关于社会性是人类的类属性这一经典判断为基

础，并从科学认知的角度考察和界定了几种符号学类型各自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生成机制，尤其对其各自的意义张力特征进行了基本性界定及隐而不彰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在人类的交往体系及文化体系中，几种具有不同意义张力程度的符号学类型间的嬗递，以及在意义张力方面渐次降低的趋势，也反映出人类社会在特定生产条件下社会心理结构的递变，并相应体现出人类交往模式及文化景观的蜕变，而这正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批评的重要考察维度及对象。因此，上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符号学类型的科学界定，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从几种符号学类型间的意义差异方面，充分深入对现代社会中人类的交往方式及文化体系以及深藏其中的生产关系的价值考察和批判之中，提供了逻辑论证的基础。

三、列斐伏尔对现代社会交往范式单义化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中，现代性问题始终受到审慎而辩证的价值判断。对于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与哲学往往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体现出浓郁的人本主义倾向，而对现代性问题的审视、反思及批判，也一度成为其评价现代社会的主要维度与方式。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成员描述并论证了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与撕裂、话语制度对人类心理结构的强制性规约等异化现象，彰显出鲜明的现代社会批判立场，并由此延伸出精神救赎观念。鉴于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及其弟子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人通过对现代社会中符号学类型间嬗变关系及过程的考察，对隐藏于其中的现代性缺陷及政治逻辑进行了深入批判，由此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视域及路径。

列斐伏尔持有与法兰克福学派相类似的现代社会文化批判立场，并将批判视野延伸至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现代性问题。关于现代性，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的西方近代学界有着极为多样而复杂的界定途径与阐述立场，而列斐伏尔亦形成了独到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解方式：“马克思在频繁运用‘现代’一词时，将其界定为资产阶级、经济增长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的确立、资本主义政治的呈现”（Lefebvre, 1995, p. 169）；同时，他援引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关于现代性的经典论述，指出现代性是现代人所特有的“短暂性及流动性”的心理结构。（p. 170）综合而言，列斐伏尔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表述为：与社会物质生产领域以及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过程

相应的人类心理及意识结构。

社会意义活动直接产生、作用于人类心理结构，其本质体现为人类对蕴含、承载着某种意义信息的各种意义形式的生产、理解与接收。同时，社会的现代化活动，往往以某种意义形式作用和表征于人类心理结构。列斐伏尔提出，现代化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等诸多领域业已呈现出人际交往及文化体系的形式化、去意义化的“恐怖主义”（terrorism）特征^①，并且该特征也在人类心理结构中普遍呈现，形成现代性缺陷。形式化，成为现代社会诸多领域最为主要的意义样态，而在这种现代社会语境中，人类生活领域中所应当蕴藏的丰富内涵被剥夺，进而体现出现代人心理结构的僵化以及对生命本真体验的缺失。对现代社会中“恐怖”形式的反思，成为列斐伏尔现代社会批判的重要维度，而其基于符号学维度的现代性省思，正源于这一基本思想框架。

关于几种符号学类型各自的本质及特征，列斐伏尔与前述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差异主要体现在符号上。他基本采纳了索绪尔对符号的结构主义式界定，指出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性集中体现为人类特定群体对对象及概念的群体化规定过程，并由此不断形成涵盖这一群体的语言、话语（discourse）等表意体系：“语言专横而必要性地使用词汇来确认感觉和行动，并不断地消除模糊性和误解。”（Lefebvre, 2008, p. 282）此处，列斐伏尔特别强调了符号整合特定群体内部关于对象的表意方式的逻辑性（logical）功能，亦即在符号体系内部，不同符号表意方式之间具有统一协调性（coherence）（p. 283）；也就是说，群体成员往往以统一性表意形式，亦即语言、话语等符号形式，来表征社会实践的诸多方面，使得混沌的世界通过诸多符号分节（articulation），逐渐形成庞大的符号体系，而这种符号体系与自然及社会实践间的关系具有稳固的逻辑统一性，亦即表意过程的相对恒定和单一性。

同时，信号作为一种指示性单义机制，其主要特点体现为“并不或极少提供信息，它仅仅具有提示‘阻止’或‘同意’、‘排除’或‘允许’的功能”（p. 279）。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除沙夫等人外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疏于阐述的“象征”，列斐伏尔同样有清晰的界定。在他看来，象征能够被寄予和表达特定群体一系列丰沛的情感及价值因素：“象征，往往意指一种情感的投入品，一种感情充沛的事物（如恐惧、魅力等），这些情感能够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

^① 详见列斐伏尔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一书中“Terrorism and Everyday Life”一章。

得到积淀，并因而在任何地方都能‘表达’每个人的利益。”（p. 141）

由此，三种符号学类型的差异便体现在“信号完全呈现和消逝于其自身功能范畴中；符号（语词）只有在符号群及其相互影响中才有其合理性……而象征则代表它自己，充盈着丰富的意义”（p. 284）。与符号和信号相比，象征的主要差异体现为往往能够在特定群体内彰显出丰富的意义及精神内涵。三种符号学类型无不以各自不同的表意实践，表征着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各项生产、交往活动的具体内容，并呈现出相应的意义模式。

西方历史自上古时期直至近现代，其社会文化形态的转换过程，往往是由三种符号学类型形态间的递变而得以呈现的，“象征的显赫地位，曾经持续许多世纪之久，它们源自自然，却暗含着特定的社会内涵（implications）。但在我们西方文明的最近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印刷术被发明后，从象征到作为符号的、权威性日益增强的书写词汇间，存在明显的转换。如今，一种从符号到信号的进一步的转换即将产生”（Lefebvre, 1984, p. 62）。马克思指出，缩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成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2009，pp. 52—54）因此，生产过程及生活中对交际效率的追求，便同样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象征到符号，再到信号的嬗变，由于逐渐向单义性、信息传达的快捷性和有效性方向发展，故而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交际效率方面呈渐次上升趋势；但相应地，信息传达有效性的渐次升高，却也预示着意义张力，即意义丰富程度及其价值理性的相应衰弱。这种趋势，暴露出人类精神领域的萎缩与现代性的缺陷。

从古希腊这一西方思想源头时期直至现代社会产生前，思想、真理——或曰“逻各斯”（logos），往往以神话式象征形式得以呈现；在具体社会生活中，象征也常以神话样态出现，蕴含并彰显着人类群体的感性认识、深挚情感和忠贞信念等丰富的意义内涵，为群体成员提供阐释世界及生命存在意义的方式，也为维系社会生产与生活提供行为及伦理的规范依据。尤其在西方中世纪语境中，象征往往通过宗教神话发挥表达、凝聚特定群体的精神、情感、意志的功能（Lefebvre, 2009, p. 231）。在现代社会，尽管象征在社会群体中依然能够发挥类似功能（Stevenson, 2003, p. 98），但当科学理性成为近现代人类思想方法的主流，尤其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宣告祛魅时代来临之际，符号逐渐以消解及伪装的方式取代着象征的社会作用，使人类思想观念的表达方式往往不再体现为充满着丰沛情感意义及神话意味的象征，而是以逻辑性的语言—文字（即符号）获得书写，以符号相对恒定而统一的意义形式表述着人类的思想与真理，并不断取消或替代着神话象征中的

□ 符号与传媒 (20)

多义性及精神性言说：“象征和神话传说转变成了话语主题”（Lefebvre, 2008, p. 302），“符号开始大量繁殖（书写、书面数字等），且无法与象征和平共处”（p. 303）。对于这种现象，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同样予以描述：“符号从更少的维度来指涉整体……较之象征，符号显得更加具体化。”（1986, p. 70）这种状况的成因主要在于，符号相对固定的社会表意方式及迅捷的符码传达效率优势使其更符合现代社会对生产及生活中交往效率的要求，因此在现代印刷业语境中，印刷文字与其他现代媒介的符号一样，替代和限制着象征符码的超验性精神效应。对此，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论述机械复制艺术与充满灵氛（auro）的前现代艺术间的差异性时，业已进行了经典性阐释。这样，便出现上述符号取代象征的历史文化状况，社会文化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呈现出符号所具有的意义统一性的形式特征。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象征同样能够通过语言文字而发挥功能（例如《圣经》等经典著作具有宗教象征功能），然而，以印刷文字等现代媒介为传播途径的象征品，在其符码传播的社会性、广泛性与效率性方面，均远低于作为符号系统的印刷文字，因此在现代传媒语境中，象征仍旧无法避免被符号取代的命运。

对于当代社会而言，最令人不安的是其交往及文化体系的信号化倾向。在一味追求高效率的当代生产及生活过程中，人际信息沟通的有效性被提升到人类历史上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现代工业化、技术化生产方式的广泛兴起，促使信号以其高效的信息传递支配着现代人的感知及心理结构。以信号灯为例。在红、绿两色面前，司机机械地执行“停止”或“前行”指令，并由此形成“指示/应答”的机械心理反应模式。当然，信号不仅体现为诉诸感官的物理性信息指示，在列斐伏尔看来，所有源于现代科技理性、窄化人类思维与意识的单义系统，无一不是信号的体现。现代社会中的诸多信号，以向社会成员传达某种单向指示信息的方式，约束、指示和组织着社会成员的行动方式，并逐渐将其心理领域塑形为某种单向性意义结构。在现代社会，信号往往比符号更加全面地侵入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着现代人的日常生产及生活方式，也更为严重地禁锢着现代人对诗性精神世界的感知与体验。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指出，信号代表动物的刺激性生存本能，而象征则体现人类的智慧及灵性；人类一旦失去象征对心灵世界的升华与引导，其意识及行为便可能退化至动物为维持基本生存而做出的生理性、信号性本能反应：“一旦失去象征体系（symbolism）……人类生活将被

拘囿于在其生理性需求和现实利益的狭小圈子里，也便无法寻求指向‘理想性世界’的途径，而这个世界恰以宗教、艺术……等不同维度，向人类敞开大门。”（Cassirer, 1944, p. 62）与其相似，列斐伏尔同样意识到现代社会意义领域中象征被信号取代的恶果。尽管象征依然广泛存在于现代日常生活中，但建立于科技理性基础上的单义化意义系统却不断消解着充盈于象征之中的丰沛的情感意义，从而侵蚀着人类的思维、情感世界，其中，信号尤可能以其单义性功能，使人类在僵化的社会交往模式及文化体系中失去通过象征所进行的超验性和神圣性玄想与精神追求，也因此失去对人类存在意义的价值性思考。

自 18 世纪始，西方诸多文学家及艺术家都曾试图通过文学或艺术途径，借助神话象征所蕴含的浪漫主义诗性因素^①，化解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思维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僵化。列斐伏尔亦感慨道：“瞧瞧那些试图取消戏剧性、象征性、去除意指效应的人们吧！……失去了象征，没有了虚构，在这生活与生命间，你与我如何进行这残酷的对话？”（Lefebvre, 1995, p. 100）在现代社会中，生产与生活领域对效率的一味追求，促使社会文化活动日渐呈现出单义化趋势，致使人类逐渐失去关于事物意义建构的主体性思虑，从而亦失去对自身所处境遇的、生命本真意义的反思。这样，列斐伏尔同样主张以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性审美态度和生活方式，使现代人从工具理性的思维与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并充分意识到：在诸多符号学类型中，诉诸丰沛的意义性、情感性及伦理性的象征，承载着某个群体、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记忆，并体现出人类精神世界永久的诗性诉求，从而最具有使现代人恢复盎然诗意的价值理性特质，“通过强化‘人类’（beings）或‘事物’的直接、基本的在场的方式，象征体系复制了它们的存在（existence）”（Lefebvre, 2008, p. 301）。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象征向符号，尤其是信号的转换，是人类丰富的情感及思维意义向无意识机械反应的蜕变，是建构诗性世界的努力逐渐衰落的过程，它标志着人性的倒退，亦体现出现代性的精神缺陷。因此，列斐伏尔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现代社会交往方式及文化体系的单义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提出以象征中的浪漫主义审美方式化解现代社会中

^① 自 18 世纪以来，作为文化思潮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因对以科学理性为精神内核的历史进步的不同理解，而在其内部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及国别传统。本文所涉浪漫主义，主要指以反思现代文明、复兴人类诗性精神生活为旨归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传统，亦涉及英国、法国浪漫主义传统中与之相关的思想倾向。

深陷单义化泥淖的人类精神，也由此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克服现代性缺陷而引发的精神救赎思考。

四、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单义化倾向的多重批判

早年的鲍德里亚曾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旨趣 (Baudrillard, 1993a, p. 20)，业已成为学界公论。^① 具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倾向的鲍德里亚，大致采取了列斐伏尔对几种符号学类型的界定方式，进一步认识到现代社会符号学类型的嬗变及其历史内涵，并对其中的现代性缺陷进行了必要的社会批判。

延续列斐伏尔的批判思路，鲍德里亚十分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媒介文化形态的单义化趋势的省察，“被媒介化的东西……是被形式/符号所重新掌控的东西，它被结合成模式，受符码的支配” (2013, p. 74)。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媒介中的符号，以其单义化的符号学形态，发挥着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功能，“(媒介)所指涉的，不是真正的物，不是真正的世界或指称的 (referential) 维度，却是从一个符号指向下一个符号” (Baudrillard, 1998, p. 125)，媒介中符号^② 的意义不再由指称物 (referent)，亦即符号所指涉的社会现实语境决定^③，而仅仅通过符号系统内部诸多组成要素间的互相指涉而生成、存在，符号也便相应丧失了获取多元意义的基本机制，由此在传播过程中仅能表达某种单一观念，并呈现出排斥其他意义价值的封闭性特征。这样，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语境中，作为社会制度维护者的编码者在符号信息的编码过程中，为其植入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现有政治、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电视‘信息’不是所播出的视像，是所强加的新型关联和知觉模式” (p. 123)，符号在被诸多社会个体解码及消费的过程中，通过向其灌输技术官僚所指定的某种单一意识形态，迫使民众失去对政治、社会等领域中历史事件进行独立反思的意识及能力。显然，鲍德里亚对现代媒介符号化的批判对象由资本主义的一般现代性问题转向了

^① 学界一般认为，鲍德里亚早期的《物体系》《消费社会》是体现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代表作。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虽同样关注符号学类型问题，但其立场与批评旨趣已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分裂。

^② *The Consumer Society* 一书的英译者此处使用了“symbol”一词，对应法文版的“symbole”，但从其所指涉的现代文化传媒语境来看，此处实指“sign”。

^③ 关于“指称物”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批评中的方法意义，参见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运用及意义》(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更具现实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

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信号化趋势的批判，同样影响到鲍德里亚。尽管较少使用“信号”这一表述，且往往将之与“符号”等术语混用，但鲍德里亚在阐述现代媒介传播文化的过程时，分明体现出对现代传媒技术信号化特征的批判。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提出，现代媒介形式是使人类形成新型心理感知结构的重要原因，而媒介内容本身则无足轻重。（McLuhan, 1964, p. 94）在这一基础上，鲍德里亚提出，现代媒介往往通过迫使接收者消费其体系中的信号而形塑人类心理感知模式。现代媒介为文化制品进行单义性编码活动，使大众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信号化特征，“交往体系在整体上从复杂的语言语法结构，转型为二元性‘问/答’的信号体系”（Baudrillard, 1993b, p. 62）。然而，信号对现代大众文化的普遍支配，使诗性话语的意义多样性特质丧失殆尽，无法体现人类思想、智慧等精神要素的延展与创新。

此处，鲍德里亚再次强调了象征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价值。鲍德里亚意识到，在西方前现代社群中，人类往往通过宗教祭仪的活动形式，以血肉、红酒和面包等象征道具作为具体交往媒介，传达特定场合中的精神文化韵味；而在现代社会中，现代人却往往通过网络、无线广播等现代媒介来进行交流，这些媒介活动“往往由刺激—反应、提问—回答这样的模式构成”（Baudrillard, 1998, p. 105），它们并不以媒介自身内容感染参与者的精神世界，而是使其仅仅满足于在这种交往、互动活动中所获取的刺激，从而在无意中削弱甚至忽略交往内容的精神意蕴。因此，具有浓郁情感象征意味的前现代交往方式，蜕变为建立于现代科技基础上的信号系统：“交往活动不会像以往那样，通过象征媒介来完成，而是通过技术手段”，“人们所共同浸渍其中的不再是‘文化’：鲜活的身体、灵动的群体（所有为仪式和盛宴带来象征和活力的事物）……而是由符号和参照物组成的怪异躯壳”。（p. 103）显然，较之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交往方式中符号、信号取代象征的倾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立场上，予以了更为辩证而全面的考察，并将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的反思进一步延展到具体政治领域，从而体现出更为深入的批判思路。

鲍德里亚曾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社会中符号取代象征的趋势。在对现代家庭陈设的考察中，鲍德里亚认识到，在传统家庭中，代表着传统道德的家具，作为家庭父权秩序意义的承载者，发挥着明显的象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

家具则平等地参与对家庭整体意义系统的建构过程，也便因发挥出结构主义式符号功能而相应地失去昔日的象征意义。对此，学界的论述较为完备，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鲍德里亚与列斐伏尔一样，体现出某种浪漫主义批判倾向。在他看来，古董和藏品尽管同样可以被纳入功能性的符号系统之内，却由于发挥着象征时间的功能，而使自身从符号系统中脱颖而出。通过古董，人类能够依稀品味到苍茫而神秘的历史况味及蕴含于其中的真实内韵 (authenticity)。诚如本雅明所言，前现代时期的艺术品，往往以其巫术般的灵氛撩动现代人的心魄。尤其在充满工业秩序的现代社会中，古董更能使人类通过对久远世界的玄想，从工具理性中获得一丝浪漫主义的精神解脱。鲍德里亚同样认为，古董所蕴含的历史象征，能够使其在家庭陈设的符号系统中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并以此洋溢着某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气质：“古董象征着精神超越以及某种在现实中的冥想，滋养着人们的神话性观念与个体观念……它们弥散在人间，重新安置着这个世界，与功能组织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不断延伸着的属性分庭抗礼。” (Baudrillard, 1996, pp. 79-80) 即便被安置于符号系统性的家庭陈设中，古董也能够从由诸多陈设所共同构成的共时性结构中，体现出某种指向久远历史的象征价值。

由此，通过对象征与符号关系的描述，鲍德里亚在彰显出某种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立场时，亦体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的精神救赎诉求。

五、作为“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象征

由此可见，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都认识到，象征所具有的情感性、意义丰富性及超验性特征对现代人而言，具有使其从单义化乃至形式化导致的现代性精神危机中获得精神救赎的可能性，这正是列斐伏尔极力主张恢复象征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地位的主要原因。然而，两人更多的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谈及象征的现代救赎功能，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深入论证象征在人类社会交往及实践中的本质属性时，两人受到了限制，也未能充分阐释象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批评中的独到价值^①，因而未能在根本上超越 19 世纪的浪漫

^① 值得一提的是，本雅明 (2013) 也曾提及象征的精神超越性特质，但与列斐伏尔等一样，对象征本质的论证似不甚充分。

主义。

对此，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对象征的本质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在列斐伏尔理论的基础上^①，赫勒提出，象征指代的往往不仅是某个单一概念或指令，而是一系列审美及伦理等精神价值的综合：“象征不只牵涉意义，还往往同价值或一系列综合性价值相关——以语言或物质性形式再现这些综合性的价值”（Heller, 1984, p. 142）；象征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特殊符号学类型，是表达特定人类群体诸多情感、审美及伦理价值的媒介，也是能够使人类普遍从中直观自身的重要精神形式。

同时，赫勒将人类对自然及社会中所有对象的占有及实践后的产物称为“自在性”类本质对象化（species-essential objectivations “in itself”）（pp. 117—119），亦即所有经过人类实践加工改造并体现出人类某种社会性意志的物质性或精神性产物。所有“自在性”类本质对象化产物，无不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类集体实践的结果，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的“人具有类属性或社会属性”这一经典命题的延伸。这样，赫勒便理所当然地将包括象征在内的诸多符号学类型一并归于“自在性”类本质对象化产物的范畴。此处，赫勒虽已意识到却未能明确指出这样一种观点：与其他一般性“自在性”类本质对象化产物不同，象征往往以其鲜明的意义丰富性、情感性等价值特征，彰显出人类对置身其中的物质世界的精神创造及超越性体验，换言之，象征具备了被赫勒命名为“自为性”类本质对象化（species-essential objectivations “for itself”）的基本品质——成为超越一般物质性“自在性”类本质对象化水平并达到“特定的时期内触及的人性的自由度”的精神性自由境界的类本质对象化产物。（p. 119）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等人有时在不自觉中，将象征表述成了代表着诸多人类个体在深陷俗务泥淖中时聊以自我解脱的精神超越性，但至为重要的是，象征，体现出具有类本质的或曰社会性存在样态的人类，在历史活动，亦即现实性的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普遍具有的对物质有限性的超越诉求，以及对人类共有的精神自由状态的追求这一恒久目标；同时，亦体现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类，对具有精神自由性的理想社会状态的普遍性精神追求。质言之，象征应当被理解为承载着人类特定群体某种超越性精神意志的意识形态。

^① 赫勒在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批判路径等许多方面，均曾受列斐伏尔影响。她关于“符号”与“信号”的界定基本与列斐伏尔一致，本文不再引述。

□ 符号与传媒 (20)

总之，唯有从作为人类的类本质——社会属性——的对象化这一角度来理解象征，才能真正将对象的精神价值的阐释还原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视域，也才能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强调的精神救赎路径获得更为合理的延续与升华。

六、结语

关于人类社会符号学类型的特征及其关系，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探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对符号学类型的观照，存在考察维度和价值立场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巴赫金等人将不同符号学类型视为人类社会交往过程及文化体系的不同表征形式，并从意义的丰富性角度，对符号学类型间的关系所隐含的社会逻辑进行了科学性探讨，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对方法科学性的基本诉求。但更为重要的是，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则在这种科学认知基础上，通过对现代社会中交往方式及文化体系中象征的衰退、符号及信号化普遍兴起现象的分析，对其深层的历史社会逻辑进行了深入批判，并提出以象征中类似于德国传统的浪漫主义精神来化解由社会文化单一化所导致的人性危机。同时，赫勒则为阐释象征的现代价值进一步提供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合理途径。由此，他们关于符号学类型各自特征及嬗变关系的探讨，进一步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关于符号学的建构（秦佳阳，2014，p. 221），以及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理论思考。

引用文献：

- 本雅明 (2013). 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 (李双志等,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波德里亚, 让 (2013). 游戏与警察 (张新木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09). 资本论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佩特里莉, 苏珊; 庞齐奥, 奥古斯托 (2013). 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2.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秦佳阳 (2014). 符号学转向: 评张碧、唐小林主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1.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Baudrillard, J. (1993a).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Mike Gane (Ed.).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audrillard, J. (1993b).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Iain H. Grant, Trans.). London,

- UK: Sage Publications.
- Baudrillard, J. (1996). *The system of objects*. (B. James, Trans.).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Verso.
- Baudrillard, J.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Los Angeles, CA and London, UK: Sage.
- Cassirer, E. (1944).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York, NY: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co, U. (1979).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eller, A. (1984). *Everyday life*. (G. L. Campbell, Trans.). London, UK and Boston, MA: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risteva, J.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Toril Moi (E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H.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Sacha Rabinovitch, Trans.). New Brunswick, CA 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Lefebvre, H. (1995).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John (Moore, Trans.).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Verso.
- Lefebvre, H. (2008).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2). (John Moore, Trans.).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Verso.
- Lefebvre, H. (2009).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Gerald Moore, Trans.). Minneapolis, MN and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Morris, C. (1955).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New York, NY: George Braziller, INC.
- Petrilli, S. & Ponzio, A. (2005). *Semiotics unbounded*. Toronto, CA and Buffalo, N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Rossi-Landi, F. (1977). *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Paris, FR: Mouton.
- Schaff, A. (1962).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Oxford, UK: Pergamon Press.
- Stevenson, D. (2003). *Cities and urban cultures*. Philadelphia, PA: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
- Volosinov, V.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adislav Matejka & I. Titunik, Trans.). New York, NY: Seminar Press.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K an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张碧, 文学博士, 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方文艺学、符号

□ **符号与传媒 (20)**

学及西方文学研究。

Author:

Zhang Bi, Ph. D.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Western theory of literature, semiotics and Western literature.

Email: china _ zhangbi@163 . com